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全球化 时代的国际安全

王逸舟★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全球化 时代的国际安全

王逸舟 ★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王逸舟主编.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7-208-03273-4

I.全… II.王… III.国际问题-安全 IV.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053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设计 王 俭

美术编辑 孙宝堂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王逸舟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51,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273-4/D·588

定价 28.00 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煮 陈 昕 黄仁伟

1250 13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

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生。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转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

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时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饕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主编手记

读者在打开一本新书时，很可能先要问几个问题：作者是谁？为什么会写这本书？里面有哪些新意？换一种说法就是，它值不值得去买、去看？下面，让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大致阅读背景。

199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正式批准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冷战后的国际安全与中国的对策》。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两年多的努力，到1999年年初完成了这份研究报告；考虑到书籍的特点及报告本身的性质，以专著出版的最终成果，更名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本书各章的作者分别是：第一章，梁光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二章，李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第三章，孟祥青（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世界政治经济教研室副教授）；第四章，何勇田（原世经政所研究人员，现留学美国）；第五章，赵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第六章，王东（世经政所研究人员）；第七章，马杰（安徽省财贸学院副教授）；第八章，王鸣鸣（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第九章，吴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大校研究员);第十章,卢国学(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第十一章,李东燕(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第十二章,洪源(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第十三章,李小丽(世经政所副处级调研员);第十四章,高华(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第十五章,郝润昌(世经政所研究员);第十六章,高恒(世经政所研究员)。课题组成员中,少数是社科院多年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资深学者,多半是世经政所的中生代骨干,还有几位是笔者特邀的所外、院外的知名专家;从以往的工作看,他们中有的人擅长宏观综述,有的人精于细微解析,有的喜欢对策研究,有的看重方法论的探讨。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不论年长年轻、有什么样的研究风格,所有成员都很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达的此项任务,也都十分配合我作为课题主持人的工作及各种要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尽心尽力,充分贡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也不难看出,总体而言,承担和完成本书写作工作的,是一个高层次的研究集体,代表着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安全领域比较前沿的观察和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权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经常面临领导部门和社会各界提出的各种任务及咨询要求。我院各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如美国所、欧洲所、日本所和亚太所及世经政所等),当然属于社科院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往的发展,国际问题、尤其是与外交相关的问题更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需求和政府关注。《冷战后的国际安全与中国的对策》,便是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根据多方调研,于1996年下达的几十项重大研究项目之一,并且在此后的第三年被追认为我院跨世纪重大举措[1121]重点工程(也称“人才和精品工程”)的项目之

一。1996年向院科研局项目申请时,我正担任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并且最终幸运地得到院所两级领导和专家组的支持与认可,来承接和主持这个院级重点课题。印象里最深的一点感受是,那时自己真觉得责任很重、压力很大。课题组很快建立起来,工作迅速展开;由于各种原因,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两位研究人员退出了课题组,又有三位专家应邀加盟。书稿框架设计先后五易其稿,除课题组全体成员讨论和论证外,还广泛吸收了所内外专家及上级科研主管部门的意见与建议。依照商定的方案,第一阶段是各人设计自己的写作提纲和收集资料,第二阶段是写作论文和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第三阶段是书稿写作与修改,包括笔者作为课题主持人和本书主编的统稿工作。每个阶段都用去了近一年时间。在整个近三年的过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或相关成果,课题组成员先后发表了三四十篇论文和调研报告,其中不少得到社会的好评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课题组还召开了十次不同范围的研讨会和改稿会,为本书的最终成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考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雄厚实力、广泛影响和以往同它交往的经验,课题组最终选择了这家出版社作为最终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一书的出版单位,希望将此书列入已在国内国际政治学界产生广泛反响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先生很快对笔者的吁请作了积极回应,并且让以眼界高、审稿细著称的胡小静先生担任本书责任编辑;这对我们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支持,也是本书能以现在的式样呈现给读者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就说这么多,下面谈谈与全书内容相关的一些问题。

本书的主题词有两个,一是全球化,二是国际安全。我以

为,对它们的正确理解,是把握全书的关键。

这两年有关“全球化”的话题已经说得很多,尤其是前年亚洲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金融震荡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可能为我们带来好处和便利,也可能造成一些麻烦甚至危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还没有充分彻底地认识这个新的时代,更谈不上很好地应对和驾驭它。可以列举几个事例: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1997年7月泰国出现货币金融风暴之前,更不用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之前,整个亚洲和全球其他区域的宏观经济形势——单从一些经济指数上衡量——还是不错的,至少没有显露任何严重的危机迹象。也许有人会反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时的一篇论文《亚洲神话的破灭》里有过预测。我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克鲁格曼当时的确力排众议,看到了东亚“小老虎们”的某些问题,比如他指出,亚洲国家过分注重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但产品和结构的技术含量较低,然而他预见的,仅仅是增长速度将会趋缓、曾经风光一时的“起飞”奇迹可能不再持续,丝毫没有提及今天世人所谈论的金融风暴或社会动荡或政治麻烦,没有预测索罗斯式的投机、获利或失败,没有涉及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目前的宏观经济危机。人对世界的认识,往往离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由亨廷顿教授的一篇论文《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至今仍未止息的争论,也有类似的特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预见,冷战结束以后,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多个宗教之间,会发生大的碰撞,甚至导致“文明间的根本对抗”;可他没有、也很难说明,为什么这些早已存在的差异,会在今天或遥远的将来,产生与过去的时代大相径庭的后果。是前苏联的瓦解,还是科技的进步,拟或是原教旨主义的

复兴,以及其他的什么因素在发生作用?亨廷顿教授似乎做了一点暗示,又都没有肯定的结论。其实这怨不得他,形势终究比人强,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含糊一点总比算命先生的断言要好。再看一个事例:现在一打开电视,老听到大气污染、臭氧层被破坏、城市热岛效应等等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了,但是,究竟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是否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恶果,是否会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社会带来损害,今后这些问题还可能朝哪些方向演化,多数人其实是没有数的。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具体表现:它把地球各个地块、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拉得愈来愈近,却又令人们处于一种很混沌、很无奈的行动状态和思想状态。笔者曾经指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人类的确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被感知的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世界大势表现出急剧变动的征兆,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不论决策者或普通人,他们中的多数还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变化的必然性相适应。所谓‘全球化’命题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理论,反映了试图解读这个新的时代和自我解惑的某种努力。”(《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现实与思想的距离着眼,我以为,对全球化的定义还是宽泛一些为好。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这样那样的概括,经济学家多半指全球市场化、区域集团化、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彼此依存、跨国公司日益具有支配性影响等现象;社会学家讲的是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各国社会结构的“同构”趋势;文化学家用这一词汇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排斥传统艺术的过程;政治学家试图用它分析政治制度

的民主化浪潮或者国际道义和国际干涉的增强趋势；军事学家的所谓“全球战略”强调的是各国对高科技的重视、更开阔的决策视野和地缘军事观的扩展，等等。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人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也有人想要揭示世界的总体前景。一些定义重点放在全球化的“全球性”上，另一些定义锁定在全球化的“化”字上。所有这些定义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单个地讲又都无法囊括所有要素。看看各国专家们对全球化所在的 20 世纪的概括罢：“世界大战的世纪”，“意识形态和冷战的世纪”，“全球性政治转型的世纪”，“极端的年代”，“恐怖的年代”，“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历史终结的世纪”，“民主胜利的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灭亡的世纪”，“极权主义退隐的世纪”，“各种‘主义’衰败的世纪”，“经济一体化的世纪”，“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世纪”，“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世纪”，“技术变革的世纪”，“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的世纪”，“生产加速提高的世纪”，“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我们应当记住它们的“真理颗粒”，同时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把它们的有用成分综合起来，构造全球化的“立体画面”。本书所赖以为大背景的，就是这样一种没有明确定义、至少没有统一定义的“全球化”，是由无数的“真理颗粒”组成的、动态的“立体画面”。我们深信：第一，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意”不光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内涵方面的更新，它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际安全的新特点；第二，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化进程，又是一个涉及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震荡；第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也可能扩大矛盾、

差距、冲突和斗争；第四，全球化的端倪现在刚刚展露，任何评说都不会、也不可能一览无遗地涵盖它的所有侧面和前景。因此，研究者不能不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和方式看待全球化问题。

不论上述想法是否为所有课题组成员完全认可，我想至少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全球化是我们看待当代国际安全的大背景，是研究人员无法回避的“当下语境”。

本书的另一个核心的、也许更重要的范畴——“国际安全”，同样是一个富有弹性、颇有争议的概念，而且，我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国际安全的认识和理解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存在着两种很不一样的安全观念。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不论古代、现代、当代——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拼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战略和策略，如结盟制裁、确立均势、加强实力、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部分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这种安全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至于他人的安全需求，它是不太考虑的，说得严重一点，旧的安全观是以制约和压倒对方为基础的。一旦大家都这样考虑，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一种所谓的“囚犯困境”：各国都在增强自己的相

对实力,而国际和平变得越来越缺乏保障。看看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罢,无非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弈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都是这种安全观占据支配地位,其中,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既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画面,也是一幅“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比较机械、比较单调的“平面示意图”。

近些年来,尤其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消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信息爆炸、难民救助、制止走私贩毒、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新因素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思想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亘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朝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慢慢演化的,国际关系虽然仍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到了当代,它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协调机制,出现了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氛围;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与法律相提并论,但它们毕竟变得比从

前更有效和有力;随着边界作用的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淡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止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如贩卖毒品)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包括难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总之,新的安全观所要“综合”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很显然,它不仅在研究范围上广得多,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很不一样的哲学思想基础,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复杂得多、充满变数、动态发展的“立体画面”。

以往人们讲安全,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如不受外来侵略、不被他国控制、不危害本国主权等等。事实上,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和有效,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干部分,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部分,各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和各种政策仍然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捍卫,例如领土任人分割,外交事务由外部势力操纵,或者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取决于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因素,那么,可以想象,不仅这个国家谈不上任何安全,而且,由此类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或国际社会同样是不安宁和不稳定的。近五百年来由欧洲发源、逐渐成为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充分的事实一再向世人证明,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